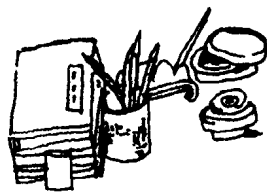


当代学者文史丛谈

黄裳
著

书林一枝

山西古籍出版社



山西教育出版社

社 长 张安塞
总编辑 孙安邦

书 林 一 枝

黄 裳 著

*

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桥东街东岗巷110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375 字数: 158千字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5 000册

*

ISBN 7—80598—209—0

1·104 定价: 9.00元

目 录

《鸳鸯曲》笺证

——吴昌时事辑 (1)

附：补记 (31)

关于吴梅村 (42)

吴梅村《南湖春雨图》 (53)

张岱《琅嬛文集》跋 (58)

张岱的《史阙》 (65)

关于祁承燦

——读《澹生堂文集》 (70)

山阴祁氏家难始末

——《远山堂曲品剧品校录》后记 (79)

一册纪念岳飞的诗集 (100)

附：补记 (108)

跋《城守筹略》 (110)

明代的火器

——跋《利器集》 (118)

关于李因

——跋《竹笑轩吟草》 (122)

女词人徐燦

——跋《拙政园诗馀》 (127)

附：俞跋 (137)

目 录

叶跋 (138)

不死英雄

——关于张缙彦 (139)

关于周亮工 (150)

关于张远 (157)

清代的禁书 (164)

生小说红楼 (171)

沈从文和他的新书

——读《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177)

禁本小记 (187)

《鸳鸯曲》笺证

——吴昌时事辑

远在两年前，到嘉兴去玩了一次，回来写了一篇《鸳鸯记》，投稿给一家杂志。不料这杂志关了门，我的一万多字的文章也就没有了下落。几次想重写，都因为没有时间、兴致而不果。去年吴辰伯先生南来，又提起此文，说写出来算了。半年来胡乱翻书，又收集了不少材料，而且读读晚明野史，也正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看看那种腐败的政治，文人的丑态，社会的大变动，一件件都新鲜得很。因为《文艺复兴》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号缺稿，想想索性就把这文章改成“笺证”写出来。虽然从来不曾写过考证的文章，自己预感着这篇《笺证》一定要离题不近，然而这些也都只好不去管了。

最初引起我写这篇文章的兴趣的，当然是吴梅村的这一首诗。这诗在梅村集中虽然没有《圆圆曲》那么出风头，不过我觉得是写得很好的。而且我还感到，《鸳鸯曲》在情感上表现的浓挚与凄凉，都要比《圆圆曲》来得重。一个不过是“家国之感”，另一篇就更还夹杂了“身世之悲”。陈田在《明诗纪事》（辛签卷二十二朱隗诗里）注说：“鸳鸯主人，嘉兴吴昌时也。昌时名在

复社，颇为东林效奔走，官吏部郎。通厂卫，赃私狼藉，电发不斥其名，梅村《鸳湖曲》亦多哀愍之词，盖诗人忠厚之遗也。”我很怀疑这所谓“诗人的忠厚”。中国的文人，有时候是颇不忠厚的，尤其在发生了“门户之见”的时候，要“忠厚”，也还是为了“门户之见”。

朱竹垞《静志居诗话》：

诗流结社，自宋元以来代有之。迨明庆历间，白门再会，称极盛矣。至于文社，始天启甲子。合吴郡金沙携李仅十有一人，张溥天如、张采丰章、杨廷枢维斗、杨彝子常、顾梦麟麟士、朱隗云子、王启荣惠常、周铨简臣，周鍾介生、吴昌时来之、钱旂彦林，分主五经文字之选。而效奔走以裹厥事者，嘉兴府学生孙淳孟朴也。是曰应社。

这个应社里，包括了二张、二周和吴来之。有的是儒林重望，也就是在野的党魁（后来的复社）；有的则走入仕途，作政治活动，成为一时的风云人物。晚明一局政治的幕后策动物，几乎都在这里了。这个应社后来经张溥、周鍾、吴昌时等的推广而变成了“广应社”，张溥《七录斋集》卷三存稿，《广应社再序》结尾说：“是故介生发扬其大而予复兢兢焉。盖即来之、彦林推广之意，而加详之，所以明有亲也。”

在这最初的应社里，那目的是在“尊经复古”、“五经选义”。根据张溥的《五经征文序》（《七录斋集》卷三存稿），张天如主《易》，而吴昌时则是主《书》的。

吴伟业（梅村）则比较晚一辈，是张天如的弟子。《梅村家藏稿》后面的《年谱》卷一里，天启二年，梅村才十四岁，就为张天如赏识了，“见而叹曰：‘文章正印，在此子矣！’”做了他的学生。过了两年张天如将应社推广合并而创举了“复社”，梅村也就入社，“为入室弟子”。这位先生比起学生来，大了才不过七岁。

到了崇祯三年，梅村年二十二岁，省试中式。他写的《复社纪事》里说：“三年庚午省试，胥会于金陵，江淮宣歙之士咸在。主江南试为江西姜燕及（曰广）先生。榜发，维斗袞然为举首，自先生以下，若卧子及伟业辈凡一二十人列荐名。吴江吴来之昌时亦与焉，称得士。”

吴梅村写这段文章的时候是得意的。他自己和老师（张溥）都高中了，前辈吴昌时也是同榜，成了同年。还有不少社友也中了，于是就举行“金陵大会”。这样，我们可以知道《鸳湖曲》的作者和诗里主人的一段并不浅的渊源。

诗云（根据董康刻的《梅村家藏稿》，有异字用靳荣藩《吴诗集览》本校）：

鸳鸯湖畔草黏（粘）天，二月春深好放船。

柳叶乱飘千尺语（雨），桃花斜带一溪烟。

烟雨迷离不知处，旧堤却认门前树。

树上流莺三两声，十年此地扁舟住。

在这里，我想多少要提一下这个“鸳湖”。

三百年前的诗人的描写，和现在嘉兴的南湖光景大约相去不远，如果说少有变迁，我想也许是那湖更荒秽了，粘天的水草，更多了，简直使荡舟的人觉得不胜逼仄。那个“烟雨楼”却还好好的，不过也已经是后来重修过的了。我坐在楼上凭槛喝茶，看眼前的一片浓绿，阴森得很，那树真是很高大，总有几百年的寿命了。莺声不曾听到，却看见无数白鹭在树上飞起飞落，有时候也叫上一声两声。

《鸳湖曲》的诗题下面，吴梅村加了一个小标题是“为竹亭作”。这“竹亭”就指的是“吴昌时”，竹亭是他的花园的名字，至于这竹亭与烟雨楼的关系，现在也无法知道。

竹亭在当时是江南的名园，是有名的园亭塑手张南垣的杰作。吴梅村有《张南垣传》（《家藏稿》卷五十一）：

张南垣，名涟，南垣其字，华亭人，徙秀州，又为秀州人。……其垒石最工。……其所为园则李工部之横云、虞观察之预园、王奉常之乐郊、钱宗伯之拂水、吴吏部之竹亭为最著。

阮葵生《茶余客话》里也有同样的记载。大抵都称赞他的假山叠得好。在烟雨楼的后面，现在还保留着好一片假山，十分曲折而灵巧。这种小品园艺，使我们可以想象旧时士大夫阶级的剥削的成果，是怎样侵夺了别人的产业、幸福，而造成一己的佚乐与享受的。吴昌时在没有做官以前是绅士，在做官以后则是乡宦，明朝的乡绅的豪纵是有名的了。像钱牧斋、董其昌、瞿式耜这一批人，在乡下都是豪纵不法的。现在我们只看吴昌时。王肱枕作《蚓庵琐语》里说：“吴昌时官吏部，大营甲第，侵越比邻曾生基地以筑垣。曾生往争之，昌时漫应之，垣在尔基，即尔垣矣，何必争！竟不让还。”

李清撰《三垣笔记》，卷中有一则：

吴都谏麟征为余言，昌时居里时，凡公祖父母皆执贄称门下士，彼峨冠博带，此方巾短袍，延送至中门止，盖以师道自居也。有强项不执贄者，即于上台处媒孽，故无不望风而靡。

对于地方官的态度，还是这样，更不必说什么老百姓了。这些“名士”们就在这种“湖山胜地”大作其“文酒之会”。梅村另外有一首悼吴昌时的诗，题目是《予曾过吴来之竹亭湖墅，出家乐张饮，后来之以事见法，重游感赋》。这一批“复社”同人，就是时常在这里听戏，饮酒，作诗的。《鸳湖曲》：

主人爱客锦筵开，水阁风吹笑语来。

画鼓队催桃叶伎，玉箫声出柘枝台。

轻靴窄袖娇妆束，脆管繁弦竞追逐。

云鬟子弟按霓裳，雪面参军舞鸂鶒。

酒尽移船曲榭西，满湖灯火醉人归。

朝来别奏新翻曲，更出红妆向柳堤。

这一批文社的社友们就是这样地在做乐。吴昌时的好客，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在当时人的集子里面一定还留存了不少记载，我却只能找到有限的一两篇，应社最初的发起人朱云子（隗），有《咫闻斋稿》。陈田的《明诗纪事》里，选录了他的一首诗，却正可以拿来应用。

《鸳湖主人出家姬演〈牡丹亭〉记歌》：

鸳鸯湖头飒寒雨，竹户兰轩坐容与。
主人不惯留俗宾，识曲知音有心许。
徐徐邀入翠帘垂，扫地添香亦侍儿。
默默悄悄灯欲施，才看声影出参差。
氍毹只隔纱屏绿，茗垆相对人如玉。
不须粉项与檀妆，谢却哀弦及豪竹。
紫盈澹荡未能名，歌舞场中别调清。
态非作意方成艳，曲别无声始是情。
幽明人鬼皆情宅，作记穷情醒清癖。
当筵唤起老临川，玉茗堂中夜深魄。
归时风露四更初，暗省从前倍起予。
尊前此意堪生死，谁似琅琊王伯舆！

徐电发（钊）也有一首《鸳湖感旧》：

曾说荒台舞柘枝，而今空见柳丝丝。
不因重唱《鸳湖曲》，谁识南朝旧总持。

他在《本事诗》里记：

鸳湖主人，禾中某吏部也。吏部家居时，极声伎歌舞之乐。后以事见法。南湖花柳散作荒烟，东市朝衣变为蛱蝶，故吴祭酒梅村《鸳湖曲》有“芳草乍疑歌扇绿，落英错认舞衣鲜”之句，余亦赋《鸳湖感旧》云。

在张天如的《七录斋集》里面，也留下了几首诗。《诗稿》

卷二《同孟宏、孟朴、君伟、来之登烟雨楼次韵》两首：

水气连空绿，晴洲高处幽。
无山飞鸟静，有佛古堦浮。
平满归群木，苍凉上一舟。
云生感慨出，此日获芦游。

烟泽恣凭阑，高岩响带凉。
淅流趋壑缓，林月照人双。
鱼出春深草，钟声雨后隄。
问吴犹地接，门外即三江。

《七录斋集》卷二还有《同来之、孟宏、孟朴、君伟、龙洲晚眺次韵》三首，看诗里面的景物和同游的人物，大抵也是在鸳湖所作。第三首：

白成一片暗千山，平地掀狂鱼鸟间。
群水合时渔艇乱，百花静处寺门闲。
月中荇藻人归夜，楼下笙歌酒上颜。
唱别不离高塔影，折来云树美人湾。

其余两首里的断句，像“鱼凫队里看娇舞，芦荻声中惜醉颜”、“萧萧霏雨余空阁，切切新丝怯旧颜”，都可以看出这些名士纵情声色、醉态朦胧的影子。这正是吴昌时极盛的时代，“名士”不足过瘾，“选文”更不是目的所在，看到当时朝政的紊乱，又清楚地摸着崇祯皇帝的多疑心理，于是跃跃欲试，抓到一位政治舞台上的人物，来做一笔政治上的买卖了。

《鸳湖曲》第三节：

欢乐朝朝兼暮暮，七贵三公何足数。
十幅蒲帆几尺风，吹君直上长安路。
长安富贵玉骢骄，侍女薰香护早朝。
分付南湖旧花柳，好留烟月伴归桡。

崇祯一朝，宰相一共换了五十个人，这在过去的历史中，算是非常特别的例子。傅节子、李慈铭等都替这五十位宰相开过名单。皇帝既然如此多疑而不专，内阁如此频频更调，在政客看来这正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可以买空卖空的。

思宗初立，把阉党清算了一下，不过并没有做得彻底，还留下不少地下潜伏的分子。当时，内阁里几乎是清一色东林党的天下。皇帝更怕手下的人抓住这个机会结党，所以想了一个“绝好”的办法，把官儿的名字写在纸条上放在金瓶里面，焚香肃拜，用手一抓，抓出谁来谁就是首揆。这方法虽然可笑，然而在皇帝看来，却是十分可靠的。不料第二次就出了毛病，没有再继续表演下去。

这时候东林的代表人物正是绰号唤做“天巧星浪子”的钱谦益。钱的作风是充分表现了过去中国士大夫的贪愚跋扈的弱点的。他想包办，弄点手法，在“抓采”以前把当时的礼部尚书温体仁、侍郎周延儒的名字都除去了。这自然使温、周大不高兴，看个机会，反咬一口，借考官受贿案的题目劾谦益，在皇帝面前对质时，又特别招出谦益以植党营私，正巧这是皇帝最怕的一点。于是，谦益一下给打了下去，黑了半辈子，在明朝灭亡以前再也不能起用。

内阁里只剩下了温体仁和周延儒，拼命和东林党人作对。

“复社”这时候就把一员大将，大家认为是有点“政治才能”的吴昌时送进北京，在政治舞台上安下一着棋子。张溥《七录斋集》诗稿卷三里有一首《送吴来之北发》的诗：

赋贡王门说采珠，江皋琴水意相须。

著书二万经方盛，买纆三千调更孤。

鸳掖句传倾坐客，日华声满在天衢。

典文精切邯郸步，应撤重围让汉儒。

虽然说的是“典文”，然而实际的意思却在末一句，想抓回

内阁的大权，好好地干一下子。

这时候温体仁又弄下手法把周延儒排挤掉了，朝廷上掌权的只剩下他一个人，大权独揽，大刀阔斧地打击东林党人。文震孟、姚希孟都被挤掉，更把文震孟的亲信郑鄮害死。关于这案子，用出了政治上最阴险也最残酷的手段，说他杖母淫妹，弄得他不齿于“名教”，死了都“不得超生”。

这时候，吴梅村、吴昌时这一批复社小辈，只是隐忍地在北京等机会，敌党的铁腕还轮不到他们的头上。等到温体仁一失势，张至发一上台（张是体仁所荐），吴梅村马上就对他开了一炮，这是复社党人反攻的先声，在崇祯十年。张至发是一个庸庸碌碌的家伙，远不及温体仁的手段厉害，吴梅村这一疏简直是“打落水狗”。可是在《年谱》上却也留下了一句好听的话，“直声动朝右”了。

张至发既去，薛国观上台。薛也是温体仁所荐，是一系相承的人物。政治上的路线也还是老样子。不过这时候吴昌时已经慢慢立定了脚跟，跟薛作起对来，也初步显出了他在政治斗争上的“才能”。

昌时这时候是已经在官场中有了一点小名气的了，而且还得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绰号“摩登伽女”。李清《三垣笔记·附识》卷中记：

大僚及台谏以枚卜构竞不休，其不得于会推者遂造为二十四气之目，摇惑中外。……以吴铨曹昌时为妖气，下注“摩登伽女”。……吴谕德伟业为望气，下注“啗人马”。
.....

吴昌时做官的“伎俩”是什么呢？“通内”——走宫里的内线，拉拢裙带关系，结宠于当时最得皇帝宠幸的田妃。“通档”——这是很自然的步骤，为达到“通内”的目的，就非“通档”不可，把“侍从室”里的线索打通了，从此朝廷内情都了如

指掌，做起事来自然非常方便。“通厂卫”——结交特务，京官的一举一动，在当时，是无不在特务的监视之下的，特务一个报告，足以致达官贵人死命，抓住了特务，也就等于抓住了皇帝的耳目手足，要陷害起政敌来更是非常方便的事。

毛奇龄《彤史拾遗记》，记载田妃有一段故事：

宫中凡节令，官人以插带相饷。偶贵妃官婢戴新样花，他官皆无有。中官官婢向上叩头乞赐，上使中官出采办，越数百里不能得。上以问妃，妃曰，此象生花，出嘉兴，有吴吏部家人携来京，而妾买之。上不悦。

吴梅村《永和宫词》，也是写田妃的故事，里边有几句话：

贵妃明慧独承恩，宜笑宜愁慰玉尊。

皓齿不呈微索问，蛾眉欲蹙又温存。

本朝家法修清宴，房帷久绝珍奇荐。

敕使惟追阳羨茶，内人数减昭阳膳。

维扬服制擅江南，小阁炉烟沉水含。

私买琼花新样锦，自修水递进黄柑。

这“琼花新样锦”正说的是“象生花”；说“私买”，大概又是诗人的“温柔敦厚”罢。

《三垣笔记》，题“大理寺左寺丞臣李清恭记，中书科中书舍人臣王挺恭阅”，是李清在崇祯之间在北京做刑部吏部官的时候的笔记，记崇祯一朝的事最详悉，关于吴昌时的事迹尤多。关于昌时的通内，很有几条可以摘录：

兵科韩给谏纠曾都谏应遴，疏子递了上去以后：

次日，上置红匣中，命一内官送阁拟票。阁批有“该部参看”等语，竟留中。或见应遴与吴铨部昌时同谒一大珰，疑其妙用也（《三垣笔记》卷中）。

又记昌时通内事：

吴铨曹昌时通内，每阁票一纸必先知。先是，以众论沸

腾，具疏乞休，拟票云：吴昌时准回籍调理，病痊起用。闻周辅延儒票也。旨未下，昌时已宣言于人，谓已得温纶。及与蒋侍御拱宸质御前，拱宸几屈。惟所纠预闻旨一款，上取原票阅之，果是。故败（卷中）。

东林党人，一向是以正人君子的面目出现的，后来怎么又突然会和特务勾结起来了呢？自然这是政治上的“权宜措施”，为了“政争”，手段是可以不顾的。照当时东林人物漂亮的解释，这就叫做“法门广大”。《三垣笔记》记：

东林诸公素矜节义，以劾宦官为名高。后冯给谏元飏、孙给谏晋等倡为法门广大说。于是吴仪部昌时始与东厂比。一切行贿受贿，间被缉获，必托昌时以数千金往方免。昌时亦扬扬居功，不以为愧。予亲于徐都谏耀家见之。

交通厂卫以后就要做做拉线的生意，凡是遇到给厂卫缉获的案子，走吴仪曹的门路，送进钱去，准保太平无事。《三垣笔记》又记一事：

仙居过邑侯周谋乃熊铨曹文举同乡也，曾遣二仆入都求迁。宿娼家，酒后泄言，为厂役缉获。其予文举一禀云，所送尊翁宅内，乃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数也。又云，敝座师首揆处业有善意。东厂以闻，薛辅国观甚不悦。时冯少常元飏奉差回籍，其保举邑令秦姓者亦以书礼馈，被厂缉获。吴仪曹昌时敛金亲来力解乃息。

不料这事给薛国观知道了，报告了上去：

……国观密以闻，于是阉厂水火。而昌时自为大行，即树声气赤帜。及考选时，见上于部拟各衙，多所改定，诸阁臣颇得操拟，于是又托国观私人拜为门生。然国观疑其狡狴，弗信也。卒改科为部，仇隙日深。国观刚愎，夙与东林为难，但不闻贪秽声。数月前昌时忽语人曰，国观辈必败，吾已于厂卫处张四面网矣。国观等知之，然无如之何。不数

月果败。予曾询钱主政位坤，云有之。但视吏部升一美官，昌时必以小纸报东厂云，国观得银若干，厂皆以闻。它日赐死追赃本此（《三垣笔记》）。

这就造成了吴昌时与薛国观的第一次冲突。吴的想拜做国观的门生，绝不是想投降，而是别有企图的。薛当然不会接受，更加上为了考选一事，吴、薛之间的裂痕就更加深了一层。

吴昌时对薛国观的再度不满，是因为他考选吏部郎中的事。查东山《罪惟录》纪十七：

考选吴昌时首拟吏部，上示不测，手更定主事礼部。昌时疑薛国观所为，大恨之。

钱遵王述古堂钞本吴江戴笠撰《怀陵流寇始终录》最末的《将亡妖孽》中也提到此事，叙述较详：

韩城薛国观官金部，温体仁引之入阁，寻为首相。十一年行考选改授法，行人吴昌时已得吏部主事。上性好出奇御下，以破旧习，进士考选入台者，黎玉田岁贡、府同知许自表易位，如是者比比。昌时改祠祭司，谓是国观所为，深恨之。

花村看行侍者《谈往》中《韩城赐死》条云：

十一年举考选改授例，行人吴昌时于门户声气中称魁首，外定铨曹。会内旨别出手裁，多不依外拟，故为颠倒，以示不测，如进士考选，黎玉田以台易府同，岁贡教知许自表苏州人，以府同易台，不止一人，独昌时改祠祭司主事，憾极，谓韩城作祟，愠恨日深。京邸清议，薛或有之，必宣指之，或挑衅，或加词，水火实甚。

这样，吴昌时就设法挤去薛国观，同时更和张溥进行策划，把周延儒再度捧出台来。

薛国观的为人，《谈往》说他“性褊急，出词过刻，……人谨畏之”。有一次崇祯帝在召对的时候，叹息大小官员无不贪污，

无法可想，薛就顺口说出如果厂里面有得力的人，贪污是不会风行的，这正触着了宦寺而兼特务的王化民的大忌。昌时借这机会和王化民建立了联合阵线，打倒了薛国观。《谈往》：

时帝尚严切，曾于平台召对，闲语间帝叹曰：“目今朝臣通贿，外致东西糜餉，内致吏兵徇私，国事紊淆，生民涂炭，奈何！”忧形于色。韩城聊为解嘲曰：“使东厂得人，举朝何敢賾货！苞苴之来，或有所自！”时厂臣王化民适蹲御座后，闻之汗出浹背，骇极恨极。昌时又与化民久结义盟，忧喜相商，于是内外眈目，专伺韩城之阴。

薛国观很得皇帝的信任，对这一套不去理睬，可是结果到底给他们寻到了一个题目，这次是利用薛国观和皇族外戚的矛盾。因为薛曾经建议征收“豪门皇族资本”，解除财政困难，而这事正关系皇族戚畹的切身利益，于是反对阵线里又添上了一支新力量，薛国观就此倒台了。

杨士聪《玉堂荟记》卷上记：

上尝与韩城言及财用匱乏，韩城对以外则乡绅，内则戚畹。在乡绅者，臣等任之，在戚畹者，非出自独断不可。因以李武清为言。遂传密旨，借四十万金。冉万二、駙马各一万，而周田等近亲不与焉。

真是滑稽，而且是真确的事实。就是开刀也先从旁支远支动手，有最亲密的裙带关系的还是留下来不动。

此旨间有抄传，复严禁之，李氏殊不在意，而督之日急。武清死，复及其子国安，提家人追比。久之，国安亦死，而追比未已。周嘉定乃其儿女亲也，上疏为言，又奉严旨。于是李氏尽鬻所有，其房无人售，则拆毁贸之。……是时戚畹人人自危。

到了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抬出菩萨来：

后因皇五子病亟，遂造为九莲菩萨下降之言。九莲菩萨

者，孝定皇后梦中授经者也，觉而一字不遗，因录入佛大藏中。旋作慈寿寺，其后建九莲阁。内塑菩萨像，跨一凤而九首，乃孝定以梦中所见语塑工而为之，寺僧相传，菩萨为孝定前身，其来久矣。至是言皇五子见菩萨来，甚怪上之薄情，不念先世亲属云云。又言，如不从此改过，将来殇折不止一人，还都要唤去。大都上未至皇五子病所，皆诸人撰造节次，遣人传报。上大惧，于是传谕停止追比，复武清侯爵，而皇五子竟薨。乃心念此事皆繇韩城发端，欲诛韩城以谢孝定在天之灵（《玉堂荟记》）。

内中情事，王化民知之最早，急闻于昌时，密令台省，遍耸毁斥，实指其行私，指其弄权。特参疏日且数上（《谈往》）。

皇帝的胡涂，加上吴昌时手段的毒辣，到底使薛国观从首辅的位子上跌了下来，致仕回家了。

这时候复社的党魁张溥，正在江南“逍遥林下”，选文章，批经史，却忘记不了朝中的政事，更不能忘记他在北京安好的一着棋子——吴昌时。《七录斋集》诗稿卷二里有一首《寄吴来之》：

红叶从风溯远堤，春回烟阁静香提。

素心道路难为说，好事云屏待子题。

一诺久知千古重，三秋自此两峰齐。

平章梅雪看君子，赋有金声报紫霓。

这正像一个党魁训勉部属的话，勉励他好好的干，“千秋事业”，全寄托在政治斗争的成败上。谁说张溥是甘心终老林泉的呢？虽然他的朋友要为他辩解，不是他自动地要作政争，而是为了害怕自己被目为“党魁”，才不能不采取“以攻为守”的自卫手段。

杜登春《社事始末》说：